



庆祝复旦附中建校 55 周年

吴丽新 邓建春 李海静 主编

復旦大學附属中学
校本课程文科选讲

(上册)

-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概述
- 小说史话
- 穿行在汉字中
- 趣话汉字
- 古诗文杂谈
- 古今汉语语法比较
- 中国佛教与文化
- 生活中的地理

学林出版社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庆祝复旦附中建校 55 周年

吴丽新 邓建春 李海静 主编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校本课程文科选讲

(上册)

-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概述
- 小说史话
- 穿行在汉字中
- 趣话汉字
- 古诗文杂谈
- 古今汉语语法比较
- 中国佛教与文化
- 生活中的地理

总 主 编 谢应平 郑胤飞
编 委 华国清 陆晓康 黄荣华 沈 越
王白云 常强华 王希明 陈克明

学林出版社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前 言

复旦附中成立 55 年来,为高校输送了数万优秀学子,以自身的实力成为享有盛誉的上海市示范性名校。我们认为,赢得这一声誉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校从未把提高升学率、为高校输送拔尖人才作为唯一的办学目标。而把“提升全体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校本课程的建设,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校本课程的开设,对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能力层次,乃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提升教师队伍的层次,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促进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上升,其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在建设校本课程的实践中,我们考虑了学校师资队伍的情况,分析了学生的特点,充分注重运用科学与人文教育的新模式、新方法,鼓励新学科的开设,同时不轻视更不排斥传统学科,在教学方法上强调“以兴趣调动学生,以情趣打动学生,以理趣启发学生,以知识丰富学生,以能力提升学生”,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实践,从而使饶有兴致地投身到学习的过程之中。

目前,我校已经开设了一百多门各类课程。每学期有四十多门课可供学生选择。

实践证明,校本课程的开设,对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具有实质性的作用。正值校庆 55 周年,我们编选了这本《复旦附中校本课程(文科)选讲》,与更多关注复旦附中的人士共享,也期望大方之家予以教正。限于篇幅,不能选录更多教师的成果,这是我们的遗憾。

2005 年 5 月

目 录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概述	华国清
一、民主思想的内涵	1
二、民主思想的根源	1
三、民主的历史发展	2
四、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闪现	4
五、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与演变	5
小说史话	陆晓康
一、小说概念的历史演变	20
二、小说的起源与酝酿(上)	21
三、小说的起源与酝酿(下)	22
四、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23
五、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	24
六、唐代传奇小说(上)	25
七、唐代传奇小说(下)	26
八、宋元话本小说	28
九、元明历史小说	29
十、明代神魔小说	31
十一、明代人情小说	32
十二、明代短篇拟话本小说	33
十三、清代传奇志怪小说	34
十四、清代讽刺小说	35
十五、清代人情小说	36
十六、清末谴责小说	38
穿行在汉字中	黄荣华
导 言	41
一、“人”“鬼”之间	43
(一) 中国“人”	43
(二) 华夏“龙”	55
(三) “士”志于道	55
(四) 美“女”	57
(五) “师”威	58
(六) “君”不虐行	59
(七) “亲”亲	59
(八) “帝”字取象于革制的模拟人形	60

(九) “首”领·····	61
(十) 神出“鬼”没·····	62
(十一) 朋“友”·····	63
(十二) “爱”神·····	64
(十三) “情”何以堪·····	65
(十四) 屋内有猪称为“家”·····	66
二、其他单元(略)	
趣话汉字·····	沈 越
序 言·····	67
一、从头说起	
(一) 首、眉、目·····	67
(二) 耳、手、足·····	69
二、家庭团圆	
(一) 母、女、妇·····	70
(二) 夫、妻、父·····	70
三、动物乐园	
(一) 鱼、鸡、兔·····	71
(二) 龟、牛、象·····	71
四、大自然的歌	
(一) 山、风、金·····	72
(二) 草、树木、森林·····	73
五、衣冠楚楚	
(一) 衣、冠、履·····	74
(二) 表、服、裳·····	75
古诗文杂谈·····	王白云
一、浅说孔子论《诗经》·····	77
二、评《离骚》“求女”说·····	78
三、《孔雀东南飞》民歌特色补·····	80
四、也谈“王维山水诗与禅”·····	81
五、试论李商隐诗歌中的对立与和谐·····	83
六、读史杂谈(三则)·····	84
古今汉语语法比较·····	常强华
一、古今汉语词的结构比较·····	89
二、古今汉语词的形态比较·····	89
三、古今汉语词类比较·····	91
四、汉语量词的新增和发展·····	93
五、古今汉语句子结构的变化·····	94
六、判断句的发展和判断动词的产生·····	95
七、“把”字句的形成和发展·····	96
八、被动句和“被”字句的发展·····	96

九、省略句的古今差异	97
十、倒装句的古今差异	98
中国佛教与文化	王希明
一、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01
二、释迦牟尼与佛教的产生、发展(略)	
三、天龙八部与六道轮回(略)	
四、倒立而逝与神通(略)	
五、因果报应与缘分(略)	
六、拈花微笑与中国禅宗	106
七、六祖慧能、百丈怀海与“一花开五叶”(略)	
八、王维、苏东坡与禅师偈语(略)	
九、末法时期与净土宗(略)	
十、密宗与持咒、观想(略)	
十一、观世音菩萨与观音信仰(略)	
十二、新加坡净空法师、台湾南怀瑾先生、台湾慧律法师与当代佛教(略)	
生活中的地理	陈克明
一、我们生活的宇宙环境	115
(一) 火暴太阳	115
(二) 漫话九大行星	116
(三) 星空观测	118
(四) 神秘的黑洞	120
二、多变的大气圈	121
(一) 天气与天气系统	121
(二) 常见的气象灾害	123
(三) 用雷达和卫星监视风云变化	136
(四) 数值天气预报	138
三、人口与地理	140
(一) 人口爆炸	140
(二) 影响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因素	140
(三) 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	141
(四) 环境与人口容量	142
四、文化与地理	143
(一) 我国南北文化差异	143
(二) 文化的内涵	144
(三) 文化与环境的关系	144
(四) 文化扩散和文化传播	144
(五) 中美文化对比	146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概述

一、民主思想的内涵

民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民主,列宁有过完整精辟的论述:“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地有系统地为人民使用暴力,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民主,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意味着排斥个人的专断。凡是遵循或体现这些原则、精神的政策、法令、制度、思想等等,都可以纳入民主的范畴。民主思想,主要是指关于民主政体的思想,同时也应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诸如自由思想、平等思想、分权思想、法治思想等等。

二、民主思想的根源

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是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为其深厚根源的。

从近代民主政治、民主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民主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由资产阶级首先提出,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而形成的。为什么民主政治、民主思想必然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呢?这是因为商品经济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劳动所采取的方式,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进行的,即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交换,而不是按照某种个别劳动时间相交换;它只承认社会的共同意志,而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取舍。概言之,商品经济的本性是,不承认任何特权和强制,坚决维护双方所处的平等地位;商品经济的要求是,买卖双方都有自由买卖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商品经济要求保障商品、货币所有者的所有权,在政治上有民主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看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这即是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和表现。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只不过是商品经济民主、自由、平等的反映和表现而已。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民主思想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商品经济是一种自主、自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而商品交换又是在广泛的社会分工的条件下进行的,每一社会分工、每一个别生产者的劳动,都是整个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但每一生产者的个别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则要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生产者自身的利益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能得到实现。而生产者要在交换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了解市场,把握市场信息,作出准确的市场判断和分析。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和经营者除了依靠自己独立自主的理性判别能力和自决能力之外,没有别的依靠。所以,商品经济在把生产者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生产出来的同时,还把商品生产者作为一个自

由自主的政治法律主体模塑出来。

第二,商品经济是一种等价交换的经济。商品经济既不同于自然经济,也不同于产品经济,它以交换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它必须遵循它本身所固有的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必然表现为平等的要求。也就是表现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之间权利义务上的对等和平等,表现为承认所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平等的人格。为此,商品经济就不仅要求有一个公正、平等的经济环境,而且要求有一个公正、平等的政治环境,要求按照商品经济的平等原则来建立社会政治权力机构及其动作机制,要求明确划分私人经济行为、营利行为与公共权力行为、服务行为的界限,限制公共权力的扩张和滥用,反对用政治权力或行政力来干预经济,以保证自由、公正、平等的经济环境。所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提出政治民主化、法律化、思想自由化的要求。

第三,商品经济是商品当事人具有自己特殊利益和自由意志的经济。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他们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追逐有利于自我发展的利益。正因为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具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利益,因而他们必须同时又具有自由意志。商品当事人的这种特殊的经济利益和自由意志,决定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要限制和约束社会公共权力,要求建立公正公开的监督约束机制,以便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杜绝和防范专制独裁、权钱交易之类的腐败行为。否则,商品当事人的特殊利益和自由意志就难以实现。

最后,商品经济是一种互相竞争、优胜劣汰的经济。竞争是商品经济的本质属性之一。哪里有商品经济,哪里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必然有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富有生命活力的重要原因。而商品生产者为了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必然要求有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环境。所以,商品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同样表现在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参与上,这就是政治生活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要求。这种要求的产生和形成,也就意味着政治不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利,而成了为公众所关注的事业。

正因为商品经济内部蕴含了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生长的文化基因,新兴资产阶级利用了商品经济固有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本性,公开打出“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的旗帜,打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摧毁了封建统治专制政治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所建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模式,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即其民主只能是少数人的民主。

三、民主的历史发展

民主问题,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人们无法单独抵御来自自然界的威胁,只能结伙成群地劳动、生活,这就决定了群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首领的推举,劳动的组织、产品的分配、矛盾的调解、战争的指挥等等公共事务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由全体民族成员及部落成员决定一切大事的民主习惯。这就是原始民主制度。

在奴隶社会,有些国家实行贵族专制制度,也有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后者以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共和国最为典型。“民主”这个词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最先使用这个词的大概是

希罗多德。在希罗多德那里,“民主”的含义是人民主权,即民主。伯里克利统治雅典时期,是雅典历史的黄金时代,也是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在雅典民主制度下,全雅典分为一百个自治区,每个区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区长、司库和三十个法官,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不仅是理论上而且是实际上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兼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多种职能。公民大会的议题是评议、审查现任公职人员的资格、政绩,并就其是留任还是免职表决。五百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兼有类似现代政府的办事职能。雅典的民主制度下还有“民众法庭”。该法庭从十个部落用抽签的办法各选出30岁以上男性公民600人共同组成,共6000人。其中5000人组成正式法庭,平均分十组,每500个陪审员组成一个法庭,其余1000人为预备陪审员。民众法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刑事和所有民事案件。另外,十将军委员会曾一度成为雅典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首席将军兼管军事、外交和财政,威望近似国家元首。首席将军虽然威望很高,但权威极其有限。伯里克利在任期间,其好友菲迪亚斯在民众法庭上受审,伯里克利亲自到庭为他作证,虽声泪俱下,但仍不能使好友免罪。

在封建社会的欧洲,在少数的城市国家,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出现过封建共和国。这些城市以经营商业手工业为主,经过交纳永久税以后,从国王那里买得自治权,成为独立的城市或共和国。城市中的贵族和市民组成议会,选举产生政府首脑,其权力受议会或议会执行机构元老院的限制。这种封建民主制只在少数地方存在过,没有普遍意义。但它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有一定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形式普遍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商品自由贸易、等价交换,要求在价值上规定把一切劳动同等看待,这就在政治上表现为摆脱专制制度束缚、废除封建特权的自由、平等的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制形式多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共和政体,一类是君主立宪政体。但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它们都实行民主选举制度,议员、总统均由选举产生;都具有完备的法律和法制机构;都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思想、人身等方面享有不可侵犯的自由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实行分权制度,任何国家元首的权力都是有限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资产阶级民主制,“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4卷,第55页)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一切社会成员应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否定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制度,它以恰当的组织和各种措施,确保了资产阶级内部充分的民主,稳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无论是奴隶主民主制、封建民主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它们在本质上都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对多数人的专政,都是极不完全的民主。在古希腊的雅典,公民确实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这个“公民”,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而只是奴隶主和自由民,广大奴隶是不算公民的。据记载,全雅典男女自由公民约九万人,而男女奴隶和被保护民共有四十一万人。九万人享有民主权利,四十一万人毫无民主权利,这就是雅典民主制的实情。封建民主制不仅存在地区极少,而且即使实行这种制度,也对选民作了种种限制,还是少数人的民主。据记载,十四世纪,在实行封建民主制典型城市的佛罗伦萨的九万居民中,获得选举权的只有五六千人。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形式上规定一切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地位平等,但实质上,资本主义制度恰恰是建立在极不平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资本家通过垄断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是最大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必然表现为在政治上的权力支配地位,这种在极不平等的地基上建立的平等大厦,也只能是少数人,即有产阶级的大厦。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它与以往民主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具有不同的性

质。无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它消除了因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在这个制度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才有可能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利,才有可能使得民主冲破历来由少数人享有的状况,真正使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当然,既然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社会主义民主也不可能是真正完全的民主。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反革命和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实行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职能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人类社会真正无限制的、纯粹的民主制度的实现,有待于社会分工的消灭,按劳分配转变为按需分配,即有待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到那时,民主将变成习惯,真正完全的民主实现了,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也就消亡了,“完全的民主等于没有任何民主。这不是怪论,而是真理!”(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30页)

四、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闪现

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火花,时有闪现。

先秦时期,劳动人民就对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把统治者喻为贪得无厌的大老鼠,向往着没有压迫和剥削的自由乐土: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诗经·魏风·硕鼠》

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以“伐无道,诛暴秦”相号召,鲜明地提出了反暴政的口号。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太平”的口号,体现了不畏强暴,争取“太平”的精神。唐末农民起义要“平均”,北宋农民起义“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这些农民起义的口号,抒发了被压迫的农民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愤懑和对社会平等的热切渴望。

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更多的是从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思想家和知识界文人墨士的著作中反映出来。

《尚书》中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说法,把天的尊严与“民”而不是与君联系起来。

《荀子》中明确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孟子》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吕氏春秋》论道:“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礼记》中抒发了著名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读通鉴论》中写道:“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明夷待访录》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以上古籍和文献中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们对君主专制某一侧面或某一点上的不满,这为后来包括近代进步思想家反对君主专制提供了思想资料和历史依据。这些思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其本质是要君主对人民不要压制太重,否则将不可收拾。但反对暴政虐民、

反对独断专制、强调众人的作用等思想,与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有相通相合之处,也往往成为导致反对君主专制民主思想的前提。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孟子最得民心之意;洪秀全将《礼记》的那段话全文录入《原道醒世训》中,并据此制定了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将《礼记》一再引用,并全文抄赠友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那段反君主名言,每每为清末资产阶级学者引用;梁启超说《明夷待访录》是他学生时代刺激青年革命热情“最有力之兴奋剂”,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受此书影响“最早而最深”。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反对封建专制的这些思想,一直受到压抑和摧残,无法顺利发展,但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酷爱平等、自由的思想结晶,它像瑰丽的宝石,体积不大,却光彩夺目。在近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从中国古代反封建专制思想的武库中挑选了武器,装备自己,与封建专制进行了一幕幕英勇的战斗。

五、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与演变

(一)“九州恃气生风雷”——龚自珍在社会转型中的呼唤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号定庵。他生活在清朝江河日下的时代,深感社会危机的严重。他与当时文人不敢议论时弊不同,敢于斗胆直言。他认为清朝之所以日益衰败,官僚政客之所以腐败,主要在于清王朝封建制度的弊端。

弊端之一,是君权太重,臣权太轻。他说,无论干什么事,束缚太多太紧,必然干不好,哪怕是神技如庖丁解牛,伯牙操琴之类,如果“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答汝,少一割亦答汝;勒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勿水之思也”,则必然一事无成。君主治国的道理也是如此,君主只宜“总其大端”,对臣下“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君之何而以为治”。他认为应当加重臣权,分轻君权,“内外大臣之权,殆亦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第35页)这是分权于下的思想。

弊端之二,是朝廷崇尚的学问与现实完全脱节。他说,古代所谓师儒都是“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既通学问,又能治国,道、学、治三者合一。可是“后之为师儒则不然”,学的都是空疏无用,脱离实际的东西,“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这样,“王治下不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费,士无报国之日”,国家自然越搞越差。

弊端之三,是国家用人之法腐朽。他在著名的《明良论》中写道:凡仕宦者,由读书而登仕途,大抵需三十年,“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这样,做到一品大臣,齿发已老,精神已惫,又“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意,因退意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僇然终日,不肯自请去”,当然也就不大可能有所作为了。由于实行了这种用人论资格的制度,资格浅者安静以守格,资格深者安静以守位,对于大家来说,人为的努力都变为多余的了,“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

乾纲独揽,不容臣下染指,是君主制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学问与实事脱节,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表现;用人论资格,用奴才而压抑人才,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组织手段。龚自珍当然还没有认识得这么深刻,但他在这方面对封建专制进行了抨击。这是他被近代进步思想家奉为前驱的内在原因。

面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状况,龚自珍敏锐地感觉到天下要变了。他用“衰世”、“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等字眼形容当时的社会,认为“夜之漫漫,鸛旦不鸣,则山中之

民,有大声音起,大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11页)暴风雨就要来了。龚自珍生活在中国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时期,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打破了明清之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高潮之后长期万马齐喑的低潮局面,呼唤了近代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大风暴的到来。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鸦片战争战败后的觉醒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字默深。魏源与龚自珍是好友,世称“龚魏”。他俩在经世致用的学风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上,高度地保持了一致。鸦片战争中,他参与了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对英军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鸦片战争的失败,对这位素抱经世之志的知识分子来说,刺激很大。1841年,当被贬黜的好友林则徐嘱他在所译《四洲志》基础上编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时,他欣然从命,并在翌年编定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仔细地分析、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况,找出了中国在军事、制造业等方面与这些国家的差距,提出了在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一口号是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也是对当时闭塞、自大的封建中国的“发轫”,因为“师夷”即学习外国的事实本身,就先撕破了先前自裹于身的天下老大的外衣;原来天朝大国并不是天下老大,也还需要向“夷”学习!

魏源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痛切感到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许多弊端。他曾激烈攻击专制帝王是集天下之势、利、名于一身的最自私的人;上下隔阂的专制影响上情下传、下情上达,是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呼吸到西方吹来的新鲜空气,他以前郁积于胸中的不满,便化作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称颂倾泻出来。

他在介绍英国情况时,花了不少笔墨于议会制度,指出英国国家大事,均需经巴厘满即议会允,不是国王独裁,“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凡条例更改、职官增设、税饷、货币增减等关涉国计民生之事,都是由国王颁行议会,由议会交各具体部门执行。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年都由议会在年终审查,然后决定各官黜陟。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实行“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的办法。百姓对于政府,享有监督的权利,各种意见可刊于逐日印行的新闻纸上,各官宪政事有失,百姓可以议论批评。

在19世纪中叶的世界上,与中国专制制度反差最大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魏源以整整五卷的篇幅介绍美国。他在专述美国的《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劈头就是一段美国赞歌: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梟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询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魏源还看到了美国的富强与它的民主政治之间的联系,他说,“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他以十分钦佩的口气说:“墨利加州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他还绝口称赞不设君位,不立王侯,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瑞士:

“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

认为瑞士地处“各拥强兵”的列国之中而安然无恙，就是因为实行了民主制度。

魏源所论的“古今官家之局”，“封建郡县官家之局”，很明显就是指中国式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然也包括他当时所生活于其中的清朝专制制度。在近代，以中西政治制度相比较，以如此热情的字眼称赞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魏源是第一人。多年来，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历史地位，已为世界公认，而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推崇，却不大为人们所重视。

魏源的上述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热情称颂，决不是信口说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里面蕴藏着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疑虑和愤懑。

魏源特别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对天子高踞于万人之上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人者，天地之仁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弱，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

这既是中国古代重民思想的发挥，也是近代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先声。魏源还指出，帝王如果把自己与臣僚特别是与庶人百姓隔绝开来，那国家的命运就十分危险了。他形象地比喻说，国家好比一个人，帝王是头，宰相是股肱，诤臣是喉舌，而人民是鼻息，人之“九窍、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口可以终日闭而鼻不可一息梏”，所以古代圣人“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详”，“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师箴，腹赋，瞽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士传言，遭人木铎以徇于路，登其歌谣，审其沮视，察其谤议，于以明目达聪”，一句话，千方百计地听取人民的意见。他认为，国家昌盛的重要标志，就是人民有意见敢于公开、直接地提出，“言在都俞”，如果有话不说，放在肚里，那就危险了，“言在腹臆，其世可知矣”。

正因为魏源思想深处对封建专制深为不满，所以他才对西方民主制度赞不绝口。

（三）“新天新地新世界”——洪仁玕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主张

洪仁玕（1822—1864）广东花县人，字吉甫。1843年，洪仁玕与洪秀全创建拜上帝会，参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准备工作。后去广州学习基督教礼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他在香港，后历经艰险到达天京，被封为军师，号为干王，总理朝政。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资政新篇》。

在《资政新篇》里，洪仁玕力主在经济上、政治上全面仿效欧美资本主义。造火车、修轮船、筑道路、兴邮政、开矿山、办银行等等，是振兴中国经济切实可行的措施。在政治上，他希望统一事权、改革政治。这是洪仁玕的“新天新地新世界”的社会理想模式。“新”是企图突破旧式农民革命局限、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之“新”。举个例子来说，他是中国最早提出专利权的思想家。就政治思想而言，“新”主要体现在“上下通”和“中外平”这两个方面。一些论著讲及他的政治见解时，多从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着眼，这固然不错，但上述见解我们也可以从封建社会政治家的著作中见到。

“上下通”，是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高高在上的帝王，生长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下，其行止被局限于深宫内院里。下情难以上达，是专制主义标志之一。实现“上下通”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兴办新闻事业：“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具体措施是在各省设立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要选择品性诚实不

阿的人担任。“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使“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洪仁玕的这些主张，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他希望新闻馆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据实报道各地的经济与政治情况，改变封建王朝中长期存在的“上下梗塞，君民不通”的弊病，达到“上下通情”。

“中外平”，是指破除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夷夏秩序观，强调中国与外国在政治上的平等往来。重夷夏之大防，历来是封建统治者的头条政治戒律。在外交往来上，希望出现“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格局，以满足政治上的自大感与虚荣心。洪秀全要求洋人臣服天朝，自认为是万国的真主，仍未能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洪仁玕反对闭关锁国，主张中外的往来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傲岸自大的天朝上国观念，在知晓西方政治学说的洪仁玕面前，已不再有影响。

政治交往上的平等思想，源于洪仁玕对西方列强的正确认识。英、美、法等国的富强，在洪仁玕看来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科学技术发达，“技艺精巧”。传统夷夏秩序观念的破除，先是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开始的，接着是认识到“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比中国高明。洪仁玕深深感到，科学技术是“永古可行”的“堂堂正正之技”：“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鏢、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洪仁玕对科学技术的正确认识，是他与传统夷夏观念决裂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是政治制度先进，例如英国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法”指政治法律制度而言，对美国他也很称赞，认为其力量最强而不侵凌邻邦，对其政治制度有这样的论述：“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自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月日，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洪仁玕选集》第9页）对美国的选举制度、议会民主与总统制，作了扼要的介绍。以秘密、平等、普遍投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普选制，及由此产生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基本内容。在洪仁玕身上，我们比较明显地感受到，他是一位具有科学意识与民主精神的政治思想家。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洪仁玕在学习西方与介绍、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上，比起魏源主要在军事方面“师夷长技”的主张，要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一进步，是基于洪仁玕的新陈代谢、通观世界的理念。他认为，当今是“与番人并雄”的时代，西方比中国富强，中国就得向西方学习。“审时度势”，即以时代发展的趋势为根据，作出适应这一趋势的对策。洪仁玕所说的“变”，不是指形式而是讲事物内部新旧矛盾的变化：“夫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洪仁玕选集》第20、45页）以新代垢，是存在着的事物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即“理之自然”。进而推及到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以资本主义的“新”来替代封建主义之“垢”，就是洪仁玕在政治与经济上向往资本主义的哲学依据。“物必改而更新”，是包含革命思想的政治哲学。它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说，世界是一个运行不息、新陈代谢的过程，物极必反，一切都在不断地除旧更新，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二是说，物必改而更新，人也要不断地改过自新，“力求自新，转以新民”；三是说“咸与为新”，即通过共同努力来改善自身并进而改造世界，达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洪仁玕选集》第42、45页）的美好境界。如果说，洪秀全还没有摆脱农民起义所必需的平均主义与皇权主义倾向的话，那末，洪仁玕已经迈越出了这一历史局限性，尽管他的激进的主张，在太平天国那个时代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洪仁玕目

光远大,他知道他的理想不可能在当时付诸实施,因而在《资政新篇》篇末指出,有些设想可作长远打算。他看到中国要富强,要民主,单靠“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办法是不行的,只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他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十分相似。

(四)“速立议院”——郑观应在御侮救国道上的建树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郑观应的民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中。

郑观应在其著作中,大胆地否定封建专制。他说,中国在上古三代的时候,并不专制,“列国如有政事,则君卿相议于殿廷,士民缙绅相议于学校”,君主专制,不让臣民与议,是后来发生的:“后世不察,辄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又怨于处士横议终罹清流之祸,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未由上述”。郑观应以事事由臣民议定的三代来对照事事由君主“权衡自秉”的“后世”,断然认为专制制度是违反古先之道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郑观应《易言》上卷,第44、45页)在否定封建专制的同时,他介绍并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虽风俗各有不同,而义理未能或异”;“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他认为,议院制度是个“良法”,有了这个制度,能使国家政事,“举国咸知”,上下情通,“即此一事,颇与三代法度相符”。因此,“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混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豫期者矣”。(郑观应《易言》上卷,第1、45页)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仿行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是郑观应早期民权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对议院制度的介绍都比先前《易言》中的观点更尖锐,更完整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郑观应认为议院为国家富强之根本。他说,泰西各国,成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人第见有士马之强壮,炮船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斩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制治固有本也”。郑观应在这里非常强调“民”的作用,并认为议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这较之《易言》中附会三代,进了一步。

郑观应认为,议院为根绝专制之良方:“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公思,广众益,用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有议院,则“君相君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他得出结论说:“故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怒,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郑观应认为,议院是御侮救国的切要之政。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盛世危言》卷1,第19页)这是戊戌变法以前,中国思想界关于议院制度与挽救民族危机关系的所有议论中最集中、最明确的一段。

甲午战争后,郑观应的民权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盛世危言》的增订过程中,郑观应特别加重了对君主专制的抨击和开设议院迫切性的宣传。他在《盛世危言》的《原君》一文中指出,君主专制的出现是不合理的:“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他在《盛世危言》的《议院》一文中,提出立刻在中国实行议会制度。

认为“强邻之畏我者民心团结，若此时不设建，迟至各海疆尽被西人占据，恐欲设而不能”。郑观应把设议院提高到救国的层面，这比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要急切得多。

郑观应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对民主思想的传播，颇多自己的特色。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提出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他的民权思想，随着近代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机》增订本，大致代表了他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年三个阶段民权思想的水平，也大体代表了当时整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权思想水平。

（五）“托古改制”——康有为在民族危机中的抉择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字广厦。在民族危机的情势下，他先后游历了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对外开放多年的通商口岸，使他了解到一些西方的先进情况。1888年，他首次上书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意见。1895年，他联系各省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维新思想最大特色是“托古改制”。“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11，第267页)在变法运动中，康有为藉以鸣锣开道的主要是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书主旨是通过宣布古文经为“伪经”，启导人们对儒家经典的怀疑，松动人们对传统经学的迷信，为变法开通航道。后书是用附会、臆断的方法，把自己的变法主张，一一贴上孔学的标签，为变法寻找理论依据。

《尚书·尧典》中有关于虞舜“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的记载，康有为就说：“询于四岳”就是“四岳共和”，辟四门以开议院，“所以，《春秋》、《诗》皆言君主，唯《尧典》特发民主义”。康有为从《论衡》等书中找了四条证据，证明《尧典》每一个字都是孔子写的，因而，孔子就成为主张“共和”、“民主”的素王，“共和”、“民主”、“议院”之类的东西，也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了。

康有为认为孔子主张历史进化论。康有为认为，中国二千年来，汉、唐、宋、明，以至清代之君主专制之世，都是小康升平之世，通过变法、行君民共本，即可渐进大同之世。他强调指出，由小康到大同，一定要经过君民共主阶段，不能踏等跳级。这样，康有为就让自己的君主立宪的要求披着孔子的服装出场了。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是《大同书》。在《大同书》里，他通过描绘未来社会的大同图景，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

首先，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落后的封建制度视为人世苦难的根源之一。在“投胎之苦”中，康有为认为：不管是奴隶之子，还是帝王之子，不管是穷人之子，还是富室之子，他们“同是天子，实为同胞”，在人格上本应平等。可是在事实上，他们出世之后，有的贱如蝼蚁，有的贵极天帝，有的贫为乞丐，有的富比陶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灿然列级”和世袭的制度造成的。康有为在诉说人生的各种苦难时，不时地把它们与落后的封建制度联系起来。在讲“夭折三苦”时，他认为“夭折”与“人事不修”有极大的关系，人事不修的根源则在于国政不好，“今各国政日改良，夭民岁少矣。”在讲“水旱饥荒之苦”时，他写道：“近者欧美铁路既通，运输较捷，水利渐启，树木既多，雨泽渐匀，泛滥少，就有水旱而以铁道移粟以饲之，民命尚易保全，此进化之功也”。康有为认为，政治制度的优劣，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与苦难的轻重是成正比例的。

其次，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以激烈的言辞，严厉地批驳了封建的“三纲”。

康有为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出发，明确地指出，封建“三纲”对于人的束缚比牢狱还厉害。他写道：“凡入之情，身体受缚，则拘苦无量；魂知受缚，则神明不王。若夫名分之限禁，

体制之迫压,托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圜墙尚有甚焉”。对于“君为臣纲”,康有为从天赋人权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所谓“君为臣纲”,都是人为地造出来以限禁名分,遂其私欲的教条。对于“父为子纲”,康有为认为父母生育子女,鞠育劬劳,诚非君臣关系可比,“人非人能为人,天所生也,托藉父母生体而为人,非父母所得专也。人人直隶于天,无人能间制之”。他从自由、平等的思想出发,认为“一人身有一人身之自立,无私属焉”,如果父母虐害子女,那就“失人道独立之义,而损天赋人权之理”,“父为子纲”云云,也是人类走向太平大同的“巨碍”,“不得不除”。对于“夫为妻纲”,康有为批判得最为详细。《大同书》很多章节中,把批判“夫为妻纲”、宣传男女平等作为重要内容。“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人之男身,既知天与人权所在,而求与闻国政,亦何抑女子攘其权哉?女子亦何得听男子擅其权而不任其天职?……以公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之与女子乎!”康有为把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具体运用于妇女问题,认为男女平等乃是天赋予人之权利,尊男卑女则完全违背了天赋人权的公理。

再次,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在设计未来大同图景时,处处表现了封建专制的对立。他设想:

大同之世,没有国家,没有君主,没有军队,没有监狱,只有民主选举出来的“公政府”,“公政府只有议员,无行政官,无议长,无统领,更无帝王,大事从多数决之”。“有欲为帝王君长者……皆以大逆不道,第一罪恶,公议弃之圜土”。大同之世,无等级之分,无种族之别,无贵无贱,无主无奴,无爵位,无教主,人人平等,天下平等。

封建专制时代一切君主的淫威,官僚的暴虐、父权、夫权的压制,一切纲常名教,陋规旧俗的束缚,在大同世界都灰飞烟灭了。这些美妙的空想,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跳出封建专制制度的苦海,追求文明、自由、幸福生活的愿望。但大同的宫殿,只能建立在人类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大同道路,必须经过推翻剥削制度的革命才能到达。这一切,距康有为所生活的时代还很遥远。

(六)“誓起民权移旧俗”——梁启超在维新变法中的宏论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一系列文章。其内容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变法、民权、救国。救国是根本目的,变法是救国手段,民权是变法的核心内容。他的民权思想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宣传变专制制度为议院制度是变法的本原;(2)宣传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提出地方自立的主张。

梁启超在很多文章中反复强调变专制制度为议院制度是变法的本原。《变法通议》第二节标题就是《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本原,指变官制。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类,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的实质,就是要变专制制度为议院制度。宣传变专制制度为议院制度,揭露封建专制是导致中国贫弱的根源,同时期的康有为、严复等均每每论及。梁启超在这方面的特色,在于他考虑如何变专制制度为议院制度时,特别强调民主启蒙的重要性。

首先,他认为专制与愚民、民政与民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他说,“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专制与愚民是密切关联的。而